



新观察

# 周大新的“体贴”叙事

□王鸿生

周大新是极为体贴之人，“体贴”也是周大新式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其要旨在于缩短、弥合甚至消除距离。

千年中国的德性文化、情性文化是周大新体贴叙事的起源与落点。菩萨心、烟火气、小人物是周大新作品里随手可触的意象，他的目光习惯于朝下，心气却始终始终是向上的。他的目光习惯于朝下，心气却始终始终是向上的。在打动今日读者的同时，周大新也向历史和传统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在漫长的阅读史中，我们总是会错过一些本不该错过的作家。而最遗憾的错过，莫过于已经与某些人、某些作品相遇了，却由于迟钝、忙碌或者美学兴奋点的错位，而未能及时地识别并预见其价值。从《汉家女》开始，我陆续接触了一些周大新的作品。2006年的《湖光山色》直接切入时代病灶，构思凝练而放达，女主人公暖暖从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中艰难突围的形象，难得地透出一股鲜活的乡村新人气息。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第二十幕》，这部耗时10年完成的近百万字的长篇三部曲堪称20世纪民族丝织业的史诗，它以东方化的哀歌与赞歌相交织的和谐，对尚家四代人的追梦历程进行了沉郁、漫长的咏叹，其平缓、细致入微的笔触，黏附于人性、世事和历史的地质层蜿蜒伸展，尚达志、盛云纬、尚昌盛、宁贞、卓月等系列人物结实、饱满，他们身上承载着气节、意志强度和文化底蕴。

2008年对周大新是不幸之年，爱子周宁英年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周大新跌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长歌当哭之时，有什么东西能够慰藉一颗浸泡在痛苦里的心？卡夫卡有言，“诗和祈祷是伸向黑夜的手”，也许，对于一个拿笔的父亲来说，只有倾诉，只有通过语言把无尽的悲恸、忏悔、哀思、寻觅、希冀、幻想塑造成形，解脱的那一刻才会降临。4年后，凄婉奇谲、感天动地的《安魂》从天而降，熟悉周大新的朋友，读者一下子惊呆了，原来，在这个腼腆的寡言少语的南阳汉子身上，竟凝聚着如此深沉、坚韧的力量。

《安魂》是以阴阳睽隔的父子对话结构全书的，从愤懑于命运不公的约伯式诘难，到打开天窗放飞轻盈的灵魂，从稠密得令人心碎的共同生活记忆，到宁儿的天国游历和生、死、善、恶探讨。周大新的小说脱胎换骨，变得酷烈、浩茫而超拔，但其叙事的气息、风骨则一如既往地温婉细腻、至柔至刚。《安魂》紧贴人生苦谛，也紧贴天下父母、子女的情思、语言那样揪心，又那样从容、安详。可以料想，面对古往今来的生死之谜，要成就这么一部属于现代人的“度亡经”，作者要付出的究竟是什么。

把《安魂》与《我的丁一之旅》放在一起比较，的确能

引发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设置、情性与智性的比例安排、口语与书面语的各自侧重、父子对话与自我对话的差别等，均可带来一些有深度的文学思考。同样是招魂，同样是亡灵叙事，同样是探索生命的足迹与奥秘，与史铁生深邃、玄远、自由无羁的“心游”相比，周大新的叙事显然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

周大新是极为体贴之人，“体贴”也是周大新式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其要旨在于缩短、弥合甚至消除距离。早在本世纪初，通过长篇小说《21大厦》，周大新完整地演绎和展示过“距离”的产生、消弭或再生产过程。如何面对和料理到处存在的“距离”，可说是《21大厦》的隐性主题。这距离对叙述人“我”来讲，既是现代建筑横竖分隔的空间单元，也是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急剧降低；既是保安、清洁工与高管、总裁、画家、官员、科学家、演员的巨大差别，也是心与心的隔膜、误解及欲望的无限膨胀和人心的脆弱；既是自由的天空和壁画上跃跃欲飞的鸟，也是回望远去的老屋、庄稼地、村边小河的时间与怀想……小说以退役侦察兵“我”在21大厦当保安的换岗经历为主线，分别讲述了4层、58层、32层、43层、地下2层各类住户和勤杂员工的隐秘故事。从旁观到走近，从无奈介入到赢得信任，“我”正是凭着体贴，凭着一份不那么自在的同情和简简单单的善意，开启了一扇扇紧闭的“门”，从而打破了横亘于人心的距离与隔膜，成为各种人生际遇的倾听者、知情者，同时，也成了善与恶、罪与罚、仇恨与报复、恐惧与忏悔、升腾与坠落的见证者、讲述者。

我们看到，在这部文体上有点冒险的小说里，体贴构成了一切“相遇”的前提。无论面对的事情如何不堪，无论“我”的感受、选择如何纠结，体贴都能创造性地提供动力、契机、转折，从而使“我”的角色、位置发生从被动到主动的颠覆性变化，使“我”最终成了一个可信赖的人。

“我”与“21大厦”的关系，形象地转喻了周大新与人人、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在周大新的小说里，叙述人的身份或位置总是被摆得比较低，叙述的视角也比较节制、受限，但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人、声音不那么大的叙述人，却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出现在故事里的每一个人、场景。它有一种尊严却不傲慢，饱含同情又固执于某种戒律、尺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都尽可能地加以理解，不仅关切他们怎么样，而且关切他们何以会成为这个样。

就周大新而言，体贴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做人、为文方式。在他笔下，体贴首先是仁慈、宽恕与感恩。《湖光山色》里的村支书詹石磴曾摆布、侮辱过暖暖一家，但在其失势、中风并遭到残忍报复时，暖暖却挺身而施援手。当暖暖因举报邪欲膨胀的前夫遭致暴打而卧床不起时，詹石磴被他弟弟背着进了屋，“那哥俩怕什么也没说，詹石磴是说不出来，詹石磴是低了头把嘴闭着，只有一包东西从詹石磴那只尚能活动的手里掉在了暖暖的床上，之后，那哥俩就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很快走了出去”。这个令人难忘的细节，掉在床上的是一包晒干了的红枣，升起在楚庄王上空的一抹黄昏时分的人性余晖。周大新的叙述一般是柔和的、宽容的，但并不缺乏批判的尖锐性，有时正相反，由于与困境、与艰难、与丑陋贴得太近，体贴叙事往往更具有刺痛感。比如《第二十幕》里，年轻时就在京做了处长的高穹，没为尚氏创业出过一分力，却利欲薰心置亲情于不顾，从贪占、勒索转而找借口、打官司，企图拆分叔父创办的企业，为阻止这一无良丑剧，其瘫痪在床的生父竟咬住其手指死死不放，实在让人唏嘘不已。还有，《银饰》里为情欲错乱而死的碧兰、吕

(上接第1版)

在耳濡目染中，叶嘉莹在诗词曲的创作、评析方面迸发出更加热烈的才情，老师对诗词的体悟也渐渐融入了她的诗词审美之中。她常说，古典诗词是生命的感发与融入，伟大诗人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诗篇的，在那些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所有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因此，她第一篇研究诗词之作是《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彼时，32岁的叶嘉莹有着与王国维相似的心境，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和挫折让她常有“开时不与看，如何一霎凄凄坠”之感，所以她说“不得于心者，固不能笔之于手”，如果不是真感受、有理解，是不会把它写出来的，无论讲诗词还是写论文都要以自己的感受、体会出发。诗词之美是声音、韵律、意义合而为一的，各部分相融相生才能有意境。这个道理不难懂，但随着语言的演变、尤其是汉语普通话的推广，诗词原本的声音、韵律和节奏逐渐变得陌生。

因此，叶嘉莹一直都很重视诗词吟诵：“诗是有节奏有韵律的，学诗词先要明白入声字，读古诗就要把人声读出来，因为那是诗词美感的一部分。诗歌之美不只是意义之美，还有声音之美，不读出入声来诗的韵律就消失了，它本应该有一部分美感也就消失了。”她吟诵起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样的吟诵好似一首曲，轻重缓急，错落有致，听者也似见到了词之境。

在《中华好诗词》舞台上、在各类讲座里、在高校讲席中，叶嘉莹就这样一次次吟诵出那些句子，让听众领悟到古典诗词之美。尽管我曾在视频里多次看过她的吟诵，但当她端坐在我面前，抑扬顿挫念出

《忆秦娥》时，我还是有些恍惚了，觉得她一举手一投足都似从唐朝穿越而来，带着盛世余晖的怅惘和美好。记得席慕蓉在写到叶嘉莹时说：“当时的我，只觉得台上的叶老师是一个发光体，好像她的人和她的话语都已经合而为一。不过，我也知道，叶老师台上的光辉，并不是讲堂里的灯光可以营造出来的，而是她顾盼之间那种自在与从容，仿佛整个生命都在诗词之中涵泳。”人们常说，人生如戏，在叶嘉莹这里，恐怕应该说人生是诗了，后来她在研究杜甫、温庭筠等人的诗时则总是强调，如果是真正有生命的，有感发、有感情的，用雅也可以，用俗也可以，“如果自己没有境界、没有真正的感受，你就是堆砌成语典故，那也是没有生命的”。

## 文化传统的传承要靠下一代青年

91年来，叶嘉莹辗转大陆、台湾以及北美，这种漂泊大多是生活所迫的无奈之举，可却让她打开了不一样的视野：既有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也谙熟西方文艺理论，经历过台湾以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为好的时期。在“中”与“西”之间，她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了更科学严谨的思考。她认为，西方文学理论不是不可以用，可是使用的时候至少要对中国的东西有相当了解；如果你对自己的东西都不了解，就去用人家的东西，往往就把中国旧诗给扭曲了。从这时起，叶嘉莹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她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开始觉醒。

如叶嘉莹所言，到了海外以后她开始有对文化传承的醒觉和责任，既然从长辈、老师那里接受了文化传统，到这一代如果没有传下去，是令人愧疚的。“一个人生命的传承是靠子女，而文化传统的传承是靠下一代青年学生，生命的意义就在于

传承。”在一篇文章里她写道，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青少年不断的加入，来一同沐浴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血脉要靠年轻一代继续传承。

所以，叶嘉莹最终选择回到大陆，在南开大学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每天所为都是与诗词有关之事。谈到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她特别不喜欢说空洞的提倡，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先要传承才能谈创新，“连传承都没有传承，还谈什么创新？许多人根本就还没进去，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呢？”她觉得，传承传统文化不是靠提倡、靠写点文章就可以，而要真正去实践。这实践主要在老师，她说，如果一个老师对诗词有深刻、高远的体会，就会讲出深刻高远的境界。“所以师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就是缺少高水平师资，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年读书时有哪个老师给了你很大启发，讲的那首诗词让你至今印象深刻？你们这一代人在大学又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现在许多中文系学生不再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而只是通过学习文学史了解一个简单粗浅的概念和框架，没有进入到文学里面去，都是一些漂在外面的、非常简单的印象和概念。”她觉得，老师体会得多，讲得就丰富；老师没有体会，就讲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就是叶嘉莹总说起的，教师是她最看重的身份，也是投注时间、精力最多的。她写诗、词、曲，从来没想过将来一定要做个诗人，要写多少诗，她写的那些都是自己跑出来的；她研究诗词，也不介意一定要在学问上有什么成就，跟别人比个高低，有了想法、心得、感受就写下来，目的是让那些还没进入诗词门庭的人看了能解其中之妙。如今，她依然在带着各种学生，

道景、小银匠，《向上的台阶》里被权力崇拜扭曲的廖老七、怀宝父子，作为欲望逻辑和蒙昧文化的牺牲品，其命运轨迹被刻画得丝丝入扣，读来让人五味杂陈，仿佛远去的历史烟尘忽然回头响起了闷雷。如文火炖肉，周大新的体贴还表现为语言上的耐心。以反恐长篇《预警》为例：一个严格自律、极为谨慎的核部队作战局长，先后挺过了美色关、金钱关、诬告关，却因轻信昔日战友之情，最终落入了对手精心设置的“留学”圈套，把女儿、妻子送往国外而沦为间谍团伙的人质。小说的“上阙”有惊无险、云淡风轻，“下阙”则狂风巨浪、步步惊心，但每过一坎，作者总是控制着情节推进的速度，并随时叠加心理交锋的层次、频率。因此，主人公孔德武身上的人性弱点和军人底线，才有充分现实感和强劲说服力，方韵、金满、金盈等反社会力量卷入情感生意的诱因和各自说服自己干下去的理由，才丝丝剥茧地呈现出不同人格被残酷现实形塑的内在过程。一场严峻较量之所以被写得如此回环、往复、迟疑，时而果决，时而延宕，应不单单是为了发出一声“危险就在身边”的预警，也许，对世态、人性之畸变给予具体探究并作出精准把握才是这部作品的重心。

千年中国的德性文化、情性文化是周大新体贴叙事的起源与落点。他的语言贴心、接地气，不造作、不透支、不玩花，行云流水，随物赋形，水一般清雅，又土一般朴素，读起来充满质感，隽永而绵实。方言、土话、先人、劳作、手艺、勤俭、敬畏、孝慈、礼数，已是融化在他血液里的亲切存在。天道人伦、两极互生、阴阳冲和、体用不二的中华智慧，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思维形式和情感伦理取向。他小心地翻弄历史，摸索人性，常常能出乎意料地进入生活的暧昧地带，并及时回应着时代的焦虑。菩萨心、烟火气、小人物是周大新作品里随手可触的意象，他的目光习惯于朝下，心气却始终始终是向上的。心灵与土地的结合、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大叙事与小叙事的结合，这也是消弭文体“距离”的方式，他塑造的一系列可感知的伦理——美学形体，都不是观念化的产物，而具有扎实的生存、人性和文化依据。在打动今日读者的同时，周大新也向历史和传统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与建立在“观看”基础上的西方美学、叙事学相比，“体贴”的无距离感、非对象化、情理一体化，无疑值得当代文学实践给予激活。曾记得，在真理或美感的生成机制上，古人一向强调交感、会通、互涵、无间，强调内外冥合，身心不二，即所谓“以体悟道”。以体悟道是中国哲学的一大方法论，也是历代文化人致思、立言的传统功夫。如果说汉语中的体知、体认、体证、体现、体究等偏于认识论，那么体味、体察、体会、体恤、体谅就带有浓重的美学、伦理学意味了。周大新深谙以体悟道的精髓，他的小说从不缺乏交流感，在他的意识里，审美、认知、伦理也从来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他的体贴叙事是浑然统一的。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贴着生活、贴着人物的写作方式业已过时。但请别忘了，资本、符号、景观所汇成的“同一化”过程，已催生一种非常符号的力量，这股力量正在通过将个人变为一种符号、一种工具、一个部件来“消灭个人”。这也是今天叙事文学所遭遇的危机：人的类化使人们丧失了经验的独特性，生活的碎片化打断了记忆连续性，私人性缩减、阻碍和扭曲了我们的交往方式与表达能力。这一切，正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丧失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各种片段的凌乱记忆、感受、观念，因无法聚合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人类也许将不再拥有“故事”。而从传统中汲取抵抗这一非人化趋势的力量，正是周大新创作的价值和他带给我们的启示。

研究里很多人旧诗词写得很好，她也给幼儿园小朋友讲诗词，各有各的讲法，每当有人同她聊起诗词，她从从不敷衍，或春风化雨，或当头棒喝，只是期待可以真正对讨教者有所启悟。她说，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得失所能衡量的。大家能够喜欢“旧学”当然是好事情，不过就是不要太粗俗浮浅。

叶嘉莹并不厚古薄今，她也读新诗，对朦胧诗和现代派诗歌都有关注，“新诗里有好也有坏，旧诗也有好有坏，新诗里好的和旧诗一样，都不多”。她提起许多年前读到的朦胧诗，舒婷、顾城的诗都还可以，台湾诗人周梦蝶、痖弦、洛夫、余光中的诗都读过一些，“我还给台湾新诗人写过序言，我同样也欣赏新诗。好坏不在新旧，在诗的本身是好还是坏。”她极重视语言，认为语言文字本身有一种潜在能力，是藏在语言文字本身之中的。关于这一点，她认为西方的符号学和中国传统文论是有暗合的，“语言和思想是相联系的，没有高尚的思想，怎么能有高尚的语言呢？”

采访就要结束时，我问叶先生是不是能跟她合影。她自是应允，但还是说了句：“每个来我这里的最后都记得跟我合影，但就是不知道我说过话人们又能记得多少呢？”我想，她大概是有几分担心，又愿意再做些提醒吧，老人家真是把诗词融入了生命。不远的墙上，挂着一幅荷花图，与题有“迎渡”的匾额互为参照，成为主人的自况。即便深处乱世浮沉也不蔓不枝、香远益清，漂泊流离却仍不辞劳苦讲述古典诗词，希望以诗词度人化人。我想，这种境界当是大境界吧，想起叶先生曾在某个场合说过，《论语》对她一生有特别的影响，其中有一句话深感可以终身行之：“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 印象

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国人的思想大大解放，言论自由的空间大大扩展，众多回忆录纷纷问世，但其中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思想、又有感情、又有文采的回忆录少而又少。近读王火的回忆录《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我认为它是一部熔“史”、“思”、“情”、“文”于一炉的优秀作品。

如果不是按《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的十辑顺序，而是把书中描叙的那些事件、人物按时间先后组接、连缀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是一部由王火及其家庭生活、辐射出来的百年中国小史。王火的父亲王开疆（1890—1940），年纪轻轻就拥护和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前后，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险遭逮捕。脱险后东渡日本避难，于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深造，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授，后又任右任当监察院长的监察院内任高官。抗战期间，汪精卫曾多次威逼王开疆就范，但他正气凛然，终不屈服。1940年，他在潜赴香港的邮轮上失踪，一说系他蹈海明志，以身殉国；一说是日伪将王开疆劫回杀害。王火的岳父凌铁庵，是辛亥革命元老，辛亥革命后在安徽任第五师师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王火从小就和辛亥革命时的高层人士及国民政府的一些上层人士有所接触，耳闻辛亥革命前后和国民政府的诸多历史情况和趣闻轶事。

抗战初期，王火先是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上海读书，目睹日伪摧残的血腥罪行。1942年，上海的租界落入敌手，王火决定离开上海到大后方抗日，去重庆继续求学。一路上历经多次生命危险穿越“人间地狱”重灾区，在洛阳的可怕见闻，则使他终身难忘。等他到了重庆，看到官场中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纸醉金迷、贪污腐败现象，想起河南民众的苦难生活，他心中愤激不已。在八年抗战中，王火既有敌占区的生活体验，又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切身体会。其后，因创作《外国八路》的需要，王火对山东抗日根据地作了深入采访，对八路军在敌后艰苦卓越的抗日事迹和山东根据地民众在抗战中的英勇无畏有了切实的认知。因此，《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中有关八年抗战的叙写既全面又真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抗战中敌伪一方、国民党一方、共产党一方各自所作所为。

抗战胜利后，王火作为记者，了解国民党官员对沦陷区的“劫收”。他五次看见蒋介石目睹蒋经国1948年的“打虎”从来势汹汹到失败告终。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国民党政府只能败退台湾，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1949年，新中国最终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人民拥护，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但是，领导人以为，新中国是靠搞阶级斗争胜利得来的，在习惯思维指导下，又以为建设新中国也得以阶级斗争为纲。先是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王火因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而遭受审查。接着搞反“右派”，王火的老同学、复旦大学运中的风云人物张希文（马骏）及张啸虎等被错划成“右派”。三年困难时期，王火被下放到一个中学里任职。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火更遭受不应有的批斗和凌辱。

新时期到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王火的创作潜力像井喷一样爆发，奉献了《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霹雳三年》《东方阴影》等许多佳作，在创作丰收的同时，为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王火的创作丰收，也不会有69.8万字的大书《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从这本回忆录叙写的实际出发，它首先是百年中国在王火及其家人身上投影的一部史书。

王火是极有思想的作家。但他并没有在《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中做时代的传声筒，而是在记叙他大半生经历的过程中，思考历史和现实，自然流露了他自己鲜明的思想倾向。一是他对百年中国历经折腾、曲折，但中国还是在折腾、曲折中发展、前进原因的思索所得。在王火看来，百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多次折腾、曲折中发展前进，是因为有大量“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称帝前后、军阀混战期间、内战十年、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走过的泥泞曲折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新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不同时期、各个阶段，都有如辛亥革命前后的仁人志士、真正的共产党人、八年抗战中浴血奋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根据地的将士和顽强不屈的人民、那些含冤负屈后始终坚持信念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敢于和善于进行改革的闯将和能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正是因为他们，百年中国才能在折腾、曲折中不断发展、前进。

同时，王火对腐败这个痼疾有深入的思考。在《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中，王火不断揭示：清王朝最后覆灭是因为腐败；袁世凯和军阀们倒台，也是因为腐败；蒋介石败退台湾，说到底也是因为腐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改善，国际地位大提高；但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也是把双刃剑，一不小心，便会滋生腐败现象。这一致命伤，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告示：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必须进行到底！王火在《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里则用清廷的覆灭、袁世凯和军阀们的倒台、蒋介石的丧失大陆等历史事实，告诉读者，谁要反腐败等闲视之，或反腐败半途而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此外，王火在《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中反复流露他深思历史和现实得来的另一思想倾向：“左”并不比右好，一样会对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内伤和外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兴中国、强中国。有此自然流露的三大思想倾向，《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所提供的这些珍贵史料，也就一件件鲜活起来，焕发出思想光辉，铭刻在读者的心田。

在写作《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时，王火投入了他的全部主观感情。他对亲人的怀念、对师恩的感激，对日伪罪恶的揭露、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批判、对史事的剖析、对“外国八路”的歌颂、对友人的怀念、对海外人物的描绘，无不洋溢着强烈的爱憎之情。

《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不只为理服人，更为以情感人。王火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情满于纸，缠绵热烈，读来荡气回肠。他俩是在大后方相识相爱的。1949年，凌起凤随亲人去了台湾，王火留在大陆。组织上向王火提出，你要革命，还是要爱情？要求王火和这个“海外关系”断绝，“立刻一刀两断！”王火却坚定表示：我要革命，也要爱情！他等待凌起凤有朝一日能从台湾回归。在台湾的凌起凤，经过百般努力，终于从台湾到了香港。为了不连累家人和“保人”，凌起凤在香港演了一出假自杀。卖报人高声叫卖：看台湾来港妙龄女郎投海自杀，“凌底华（即凌起凤）”跳海“自杀”了！凌起凤就这样活着回到了大陆。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王火回忆撰写他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固然情深如海，他写友人也是一片深情，但他写敌人，无论是写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酒井隆，还是写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梁鸿志、丁默村、盛文颐，笔尖都似喷出憎恨烈火，将这些战犯和卖国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焚毁。王火的强烈爱憎感情，使他的笔触力透纸背，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王火有一手驾驭语言文字的好本领，《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的文字出色，精炼隽永，反复推敲，雅俗共赏，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耐读性。

## 回忆中的史、思、情、文

□陈辽

王火回忆录《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那些人和事》